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埃利亚斯与 现代社会理论

Norbert Elia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英]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埃利亚斯与 现代社会理论

Norbert Elia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英]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35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 / (英) 史密斯 (Smith, D.) 著; 李康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7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ISBN 978-7-301-19206-1

I. ①埃… II. ①史… ②李… III. ①埃利亚斯, N. (1897 ~ 1990) — 人物研究
②埃利亚斯, N. (1897 ~ 1990) — 思想评论 IV. ① K835.165.1 ② C91-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9199 号

Norbert Elia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by Dennis Smith.

© Dennis Smith 2001

Apart from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only with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the publishers or, in the case of reprographic reprod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licences issued by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I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ose terms should be sent to the publisher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Dennis Smith 2001.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Sage Publications Ltd 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 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

著作责任者: [英] 丹尼斯·史密斯 著 李康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206-1/C·068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280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viii>

思想的探索是一场“正经的游戏”(serious game)。只有当真利害攸关，游戏才玩得心跳。那应当拿什么当成攸关的利害呢？就是“把事情彻底搞清楚”，这和“让别人也像自己一样看世界”是不一样的。只有当游戏者的个人荣誉与他们带入游戏的特定现实模型脱钩，思想探索的游戏才是最具生产性的。^[1]而当捍卫某种模型与荣誉息息相关，求索新知就会非常困难。游戏者总会分出胜败得失，但游戏本身本质上却是毫无价值。

如果出现新的证据，或者冒出新的看待既有证据的方法，我们都应准备好随时修正自己思维的任何方面。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思维乐于纳新，保持“游戏”的开放性。对于世界的思考应当是一场探险，不懈探寻有关线索，搞清楚事情是如何运作的，可以做些什么，让它们更加美好，至少也是更可忍受。

在这场游戏中，首要之敌就是内在于自身的阻拦我们清晰思想的障碍。一位思想者独特的“观照”(vision)扮演着重要角色。观照会推动论家去往某个特定方向，或许会引导他或她看到新的领域，产生新颖的思想。但是，

[1] 原文为“most productive”，没有照日常用语译作“最富成果的”，而是凸显“和‘让别人也像自己一样看世界’是不一样的”中间的生产性意涵。如果要“最富成果”，也许这就不能再是一场游戏(game)，而是狭义的竞赛或博弈(game)了。对于这个区别，埃利亚斯看得最清楚，或者说最不清楚。——中译注(以下凡未注明者为原书注，章尾注均已改为页下注)

如果思想者不再能够超脱于自己的观照，沦为观照的仆役，这样的观照就会变成某种盲目。最糟糕的是，它会成为清晰思想的障碍。实际上，在某位思想家的追随者或门徒当中更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无论是帕森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涂尔干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埃利亚斯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者，概莫能外。

在这场正经的思想探索游戏中，诺贝特·埃利亚斯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游戏者。他涉入其间的时间相当长，其专业生涯持续了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而从这一生涯的早期开始，他就执迷于有关世界如何运作的一种牢固观照。我相信，对于埃利亚斯来说，自己作为一名德国犹太人，有着破碎的体验，而这种观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重建统合。埃利亚斯的著述，尤其是《宫廷社会》(Elias, 1983)、《文明化过程》(Elias, 1994a) 和《德国人》(Elias, 1996)，相当程度上正是他自己努力应对犹太人身份 / 认同 (identity) 和德国人身份 / 认同之间张力的斗争产物。

埃利亚斯这个姓氏属于最典型的犹太姓氏，其父是布雷斯劳 (Breslau, 今波兰弗罗茨瓦夫^[2]) 一位纺织厂主。与此相反，诺贝特这个名字则与 12 世纪天主教信仰在波兰人中的传播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基督教王国的德意志分支中，最著名的一位诺贝特就是圣诺贝特。他来自德意志北部一个贵族家庭，后来成为马格德堡 (Magdeburg) 的大主教，该城是镇压斯拉夫人中的异端学说的重镇。

埃利亚斯，作为犹太人、德国人、欧洲人乃至世界人，耗费大量时光，倾注众多精力，探索我们复杂的认同感与更广泛的社会过程这两样东西之间的关联。那些社会过程塑造了这样的认同，反过来，它们又受到我们依照这种认同而行事的方式的影响。关键词在于“探索”。埃利亚斯是一位探索者。他的作品中最富魅力的一面，就是让人感到它属于未完成的探寻。这赋予他的研究一种开放性，你会觉得它属于更大的一场探险，别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并且平等相待。

[2] 弗罗茨瓦夫 (Wrocław): 波兰西南部城市，城市建于 10 世纪，当时归波兰国王管辖。13 世纪应西里西亚当局邀请，大批德国人迁居此地。1741 年遭普鲁士攻占。后来的居民结构更受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德国化政策影响。经历纳粹占领，1945 年后重归波兰，市内居民重新回到清一色的波兰人。——中译注

本书并非专论埃利亚斯。它也谈到帕森斯、福柯、鲍曼和阿伦特。这些论家最让人产生兴趣的时候，都出现在他们的“探寻状态”，那时他们都开始执迷于世界上究竟什么才重要，或者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但还没有得到让自己满意的解答，或是沦为某一程式的代理执行人。实际上，做出最后定夺的往往是他们的某些追随者，而非这些思想家自己。

福柯毕生都在探寻，不断地重新创造自己。这使他充满了魅惑。鲍曼也是如此，他也始终在变形。帕森斯写出了《社会行动的结构》，结尾处“发现”了意愿论行动理论。但此后他再也没能写出这样一部令人激动的著作，而是忙着鉴定自己的财宝，研究规划慢慢失去了令人激动之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具有让人赞叹的“未完成”性质。在这本书里，她还在逐渐趋近《人的境况》中更为精致的哲学。

或许现在该来把这些论家中的某几位从他们的部分追随者那里拯救出来了。“社会理论”始终面临危险，可能变成封闭的“思路”的逐步累积，比如帕森斯的思路、福柯的思路、埃利亚斯的思路等等，这些人的门徒就是这样彼此谈论着往昔的。而我则想通过本书，敞开这些思路，让它们有可能相互渗透。

我并不打算把这些结果整合成一套“大理论”。乍看起来，这确实是一种诱惑，其实，大理论也没有什么骨子里的错，当它们根植于现实世界的研究，并且还要回到这些研究时，尤其如此。大理论最好是开门延客，如果没有任何单一理论能够居于主宰地位而不受挑战，就更是这样。同时，还有必要确立一种牢固的研究文化：心智开放的经验探究，随时准备怀疑常识定论。

本书安排了整整四章，依次比较埃利亚斯与阿伦特、帕森斯、福柯和鲍曼。但不管怎么说，我决定抗住诱惑，不去“整饰”这些章节比较出的结果。用落袋台球或斯诺克来打比方，我自己击球之后，还把球留在台球桌上的特定位置。这是一种特定的模式，就像我在最后一章勾绘的样子，但并不打算“整合”我的“发现”。相反，我基于得出的见解，进一步探问以下两点：欧盟运动 (European Movement) 在社会学上有什么意涵？羞辱 (humiliation) 和羞耻 (shame) 的性质是什么？

这些问题和比较都要融入一个更大的探问：考察正在发展中的全球社会的特征。这里只是在书的开篇和结语略述这项研究议程，因此非常粗略。

我将另文详述。

许多同事对我的论证的不同方面做出了评点，对此我深表谢忱。我并不自认是个“埃利亚斯主义者”。不过，我还是受益于诸多“埃利亚斯主义者”的热诚友情，比如约翰·古兹布洛姆 (Johan Goudsblom)、理查德·基尔明斯特 (Richard Kilminster)、卡斯·伍特斯 (Cas Wouters)、斯蒂芬·门内尔 (Stephen Mennell)、威廉·马斯滕布鲁克 (Willem Mastenbroek) 和范伊特森 (Ad van Irterson)。伊丽莎白·福克斯 (Elizabeth Foulkes) 也善意相助，与我分享了她对埃利亚斯的记忆。

我的思考也受助于蒂姆·牛顿 (Tim Newton)、玛莉亚·加斯特拉尔斯 (Marja Gastelaars)、特蕾莎·惠特克 (Teresa Whitaker)、休·赖特 (Sue Wright)、塔尼亚·史密斯 (Tanya Smith) 的敏锐意见。无论是本书还是其他作品，我的思路都深受埃菲琳·林德纳 (Evelin Lindner) 的洞见的影响。最后，我还要感谢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诸位同仁。

目 录

序 言	3
第一编 现代性与埃利亚斯	1
第一章 向典范开炮	3
第二章 文化与文明	27
第二编 论辩格局的拓展	57
第三章 阿伦特与埃利亚斯	59
第四章 帕森斯与埃利亚斯	91
第五章 福柯与埃利亚斯	117
第六章 鲍曼与埃利亚斯	143
第三编 趋向全球现代性	167
第七章 欧 洲	169
第八章 羞耻与羞辱	187
第九章 文明化的论辩	209
参考文献	225
主题索引	241

第一编

现代性与埃利亚斯

第一章

向典范开炮^[1]

一、现代性与埃利亚斯

诺贝特·埃利亚斯，一位以研究文明化过程著称的社会学家，值得深入研读，因为我们要想领会晚期现代性下的人的境况，他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之一。他算不上任何角度上的唯一资源，但在 20 世纪的学人提出的核心观念库中，他占据了重要一份。

对于人类和社会是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发展演变的，埃利亚斯的观照透彻有力，其核心观念如下：

- 人类作为复杂网络的组成部分共同生存于世，这些网络[埃利亚斯称之为“**型构**”(figurations)]将人、群体和制度关联在一起。
- 塑造这些型构的是**社会过程**(processes)：这些长期过程基本上未经

[1] 原文是“The Sound of Canon-Fire”，这里利用谐音，取义双关：在后文的埃利亚斯生平掠影中，会有“加农炮”(cannon)的隆隆炮声出场。——中译注

计划,但具备某种模式、结构和方向,通过对经验资料进行耐心的学术考察和细致解释,就可以发现。

- 型构和过程强有力地塑造着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构造[或称“惯习”(habitus)],并影响到他/它们有多少能力实施**控制**:控制自身,控制他人/其他群体,控制自然。
- 社会学家能够提供给人们相关的**知识**,关乎塑造其社会生存的那些社会过程和型构,从而帮助人们增进能力,以讲求理性、合乎情理的方式实施控制。
- 过去一千年来欧洲的社会发展有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趋向于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复杂的型构,有着相对**稳定的权力垄断**,并伴之以方方面面力度越来越强的控制。这些就是**文明化过程**的核心特征,这个进程业已发生,但也交织着一些显著的去文明化(decivilizing)趋向。

<2> 尽管埃利亚斯出没于本书的每一页中,但此项研究并非只是探讨埃利亚斯及其观念。本书的核心是依次就埃利亚斯与福柯、帕森斯、阿伦特、鲍曼^[2]展开系统比较。

话说回来,本书也不单单是评论埃利亚斯和其他四位社会理论家。^[3] 它

[2] 原文如此,书的序言的提法符合实际章节次序,即阿伦特、帕森斯、福柯、鲍曼。——中译注

[3] 埃利亚斯的观点此前已屡经讨论,既有人试图拓展其理论,也有人受其理论启发而展开经验研究。(例参 Swaan,1988; Elias and Dunning,1986; Goudsblom,1992; Mastenbroek,1993; Mennell,1985; Spierenberg,1984; Wouters,1986; Wouters,1992。以上书单并非完备。)埃利亚斯的挚友对上述研究均有分析。(例参 van Benthem van den Bergh,1971; Bogner,1986; Bogner,1992; Fletcher,1997; Goudsblom,1987; Kilminster,1998; van Krieken,1998; Kuzmics,1987; Mennell,1989。本书单同样并非完备。)此外,讨论埃利亚斯的论家中有一些态度友好(例参 Bauman,1979; Rojek,1986),有一些态度就不那么友好(例参 Coser,1980; Lasch,1985; Layder,1986; 亦参 Breuer,1991)。至于将埃利亚斯与其他作者作比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阿多诺、齐美尔、曼海姆、戈夫曼、福柯、卡西尔和帕森斯都得到过充分的探讨比较,而关于沃勒斯坦、哈贝马斯、森内特、布迪厄和阿伦特,也有一些比较简短的比较分析。例参 Arnason,1987; Bauman,1979; Bogner,1987; Breuer,1991; Chartier,1988a; Dechaux,1995; Eyerman,1995; Goudsblom,1987; Goudsblom,1995; Kilminster,1993; Kilminster and Wouters,1995; van Krieken,1990; Kuzmics,1988; Kuzmics,1991; Maso,1995a; Maso,1995b; Mongardini,1995; Mouzelis,1993; Newton,1999; Robertson,1992a。

也探讨了西方世界在 20 世纪的现代性体验。理论家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提供给我们抓钩,以把握这个失控的世界,至少在概念层面上有所把握。这是达成我们进行更有效实践干预所需的理解的重要一步。这些理论家帮助我们理解塑造了我们当下的过去,比如说,欧洲各大帝国的衰落,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盛衰兴亡,以及欧洲与美国之间变动不定的权力均势。他们还帮助我们领会正在形成的全球社会,这个社会似乎会促成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日趋尖锐的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的忧惧与不确定性,以及随处蔓延的基于监控的管理技术。

埃利亚斯的著述是一项重要资源,可以用来应对领会现代性这一挑战。将埃利亚斯与福柯、帕森斯、阿伦特和鲍曼逐一对比,不仅有助于确定埃利亚斯的长短优劣,也便于我们看清其他四位的利弊得失。这样一来,他们是否必然能彼此清楚暴露,相互取长补短呢?我认为是这样。

埃利亚斯的观念会对现代社会理论的未来做出重要贡献。不过,要实现这一点,并非是把所有竞争对手都赶到一边去。埃利亚斯固然有不少宝贵洞见,但也伴有一些盲点,比如不太关注大型商企,或是后熊彼特时代资本主义的特定动力机制。^[4]事实上,埃利亚斯的作品之所以富有裨益,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埃利亚斯以别具一格的方式直面西方现代性的性质,在大规模社会过程与我们的心理构造和观看、思考与感觉方式等方面的转型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联。^[5]原因之二,很简单,埃利亚斯生于 1897 年,卒于 1990 年。换言之,由于埃利亚斯得享高寿,并且治学不辍,从而成为连续两代人

[4] 埃利亚斯往往以熊彼特之前的方式来探讨资本主义,视之为中小型企业之间的竞争领域(参看 Elias, 1994b, pp.32-33)。同样来自一战前这一代人的巴林顿·摩尔也有类似的盲点,虽说两人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参看 Smith, 1983, p.145)。埃利亚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盲点,或许有不少情有可原之处。《文明化过程》的问世,要早于熊彼特及其思想传人加尔布雷思完成其最知名作品的时间,虽说对于启迪了后两位的凡勃伦的作品,埃利亚斯是很熟悉的。有关对于凡勃伦的引述,参看 Elias, 1983, p.38, p.62, p.67。

[5] 埃利亚斯显然不是唯一一位做出这类关联的人。比如说,法兰克福学派也以此作为核心关注。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埃利亚斯在法兰克福工作时,其所属的社会学系与法兰克福学派同处一栋楼,虽说这个学派是日后才得此名。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参看 Elias, 1994b, p.48; Jay, 1996; Wiggershaus, 1994。

的思想生活的组成部分。帕森斯(生于1902年)和阿伦特(生于1906年)与埃利亚斯(生于1897年^[6])来自同一代,鲍曼(生于1925年)与福柯(生于1926年)则来自下一代。

埃利亚斯的观念与和他同期的两代人的观念之间的这种创造性互动,能够帮助我们更有针对性地理解塑造了西方现代性的那些过程的结构与意义。这将有利于一项更大的任务,即发现可以从西方现代性的晚近体验中拯救出什么,以有助于我们挺过新的千年里的全球现代性,或许还能使之更加文明。

<3>

二、美国与欧洲

西方现代性是一种横跨大西洋两岸的现象^[7],本书讨论的五位论家中有两位(帕森斯与阿伦特)是美国公民。美国现代性的史诗传奇是20世纪的主要情节。整个世界注视着美国人挺过了30年代的大萧条,通过罗斯福新政和战时军备生产重新发动了资本主义机器,然后便是生活富足,焦虑丛生。所有情节中最核心的一个,也是尚未结束的一个,就是种族。

冈纳·缪尔达尔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说的话如今依然有效,虽说他的有些措辞现在看来“政治不正确”：“对于绝大部分美国白人来说，黑人问题具有特别的负面意涵。它意味着某种东西难以利落解决，同时又难以不管不顾。这让人倍感窘迫。这就造成了道德上的不安……在许多人看来……（它）具有一定的威胁，这一威胁既是生物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文化性的，有时还是政治性的。这种焦虑或许也混杂着某种个体罪疚感和集体罪疚感。极少数人可能会把问题视作对治国才略的挑战。但整体上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麻烦。”(Mrydal, 1962, p.lxxvii)

这则美国故事的下一回将如何发展，又有谁能知晓？与此同时，还有一

[6] 原文为1987年,应系排印失误。——中译注

[7] 尽管“西方”的地理边界往往延伸到包括澳大拉西亚。——原注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这个地理名词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周边南太平洋诸岛,有时也泛指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但此处其实就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译注

则同样扣人心弦的欧洲故事有待讲述。当美国人纠结于种族问题时，欧洲人正由于丧失对整个世界的帝国主宰地位而饱受精神创痛的折磨。

这个故事难以直接讲述，身处民主时代，这个主题何其敏感。说到底，欧洲的全球支配地位乃是基于对臣属国民众的支配，后者被剥夺了权力，往往遭受剥削，沦为牺牲品。不过，欧洲人对于帝国衰落的反应是复杂的。其中有两种情绪最复杂，使其他的相形失色，那就是羞耻和羞辱。欧洲人几乎还没怎么开始直面这些情绪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机制，尽管它们对于国族认同和国族政治都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都是哪些社会过程与心理过程在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塑造着羞辱和羞耻体验，尚待研究和理解。

帝国的衰落与欧盟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关于欧盟，有一桩事实值得注意，它的核心成员国就是过去欧洲各大帝国组成的“中枢社会”，只是而今几乎完全丧失了殖民地。对于巴黎、伦敦、波恩（更晚近则是柏林）、维也纳、布鲁塞尔、海牙、马德里、里斯本等地的政治当局来说，欧盟提供了一个新的家园，新的政治中心。^[8] 欧洲所有老帝国的首都在此都有代表——莫斯科除外。

欧盟的例子耐人寻味，因为表面看来，它好像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超国族政体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模型。那么，它能不能成为其他区域性组织的样板，或许还能指导全球层面上未来的发展呢？

批判考察埃利亚斯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适才提及的这些主题：帝国的失落，战后的欧盟运动，以及羞辱和羞耻在现代欧洲社会（更广泛地说是现代西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在探讨这些主题之前，我们还需要把埃利亚斯的著述放入更广泛的背景：有关现代性性质的持续争论。 <4>

三、本书的谋篇布局

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题为“现代性与埃利亚斯”，考察了埃利亚斯切入典范的方式所引发的一些问题（第一章）。然后讨论了埃利亚斯的生平经历提供了怎样的渊源，使他产生这些别具特色的思想关怀，并决定为此摸索

[8] 就连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安卡拉（Ankara，土耳其首都。——中译注）也在北约有代表，在近些年的巴尔干危机中，这个组织与欧盟走得越来越近。

一种独特的思路来探究社会学和现代性(第二章)。

书的第二编题为“论辩格局的拓展”,分别比较了埃利亚斯的思路与阿伦特(第三章)、帕森斯(第四章)、福柯(第五章)、鲍曼(第六章)等人采取的思路。这一编涵盖了现代性塑造过程中的不少相关维度,包括大屠杀的起因与特征,德国社会的性质,思想变迁的动力机制,性(sexuality)的发展演变,欧洲各大帝国的衰落的连带意涵。透过这些章节的分析,既可看出五位学人之间一些明显的分歧,也能把握不少立意会通和焦点互补。

书的第三编题为“趋向全球现代性”。我们基于埃利亚斯、帕森斯和阿伦特来说明欧盟的社会生成机制,并确定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第七章)。接下来一章,借助鲍曼、福柯和埃利亚斯的观念,考察羞辱和羞耻在现代社会、政治与组织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第八章)。最后,综合第二编的理论发现与第三编的经验探究,提出社会理论需要面向全球现代性问题(第九章)。

四、埃利亚斯、福柯、阿伦特、帕森斯与鲍曼

鲍曼和福柯都属于埃利亚斯的仰慕者^[9],他们的研究兴趣也有高度的交叠之处。至于帕森斯和阿伦特,也都像埃利亚斯一样,年轻时深受德国大学中盛行的思想冲突的影响。其实,20世纪20年代,这三位都在海德堡大学待过一阵。乍看起来,富有收益的思想交流的基础应该是存在的,事实上也的确存在。

但这桩事实已被一系列因素所掩盖:福柯反对“有关现代压抑性的话语”(Foucault, 1978, p.5),这似乎既包括马尔库塞,也有埃利亚斯的份儿;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埃利亚斯提出了批评(Bauman, 1989)^[10];埃利亚斯无视阿伦特的研究;最后,埃利亚斯还屡次直接攻击帕森斯。阿伦特

[9] “埃利亚斯确实是位社会学大师。哪怕他并不曾解答社会学过去与未来的一切问题,但就像那些极其热诚地追随他的信徒认为的那样,相比于对埃利亚斯作品的那种集体盲视,他要伟大得多。”(Bauman, 1979, p.123) 阿尔帕德·绍科尔采的研究表明,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福柯也开始熟悉埃利亚斯的作品。临终前最后几个月,福柯翻译了埃利亚斯的《濒死的孤独》,以备己用。参看 Szakolczai, 1998; Elias, 1985a。

[10] 参看 Bauman, 1989, pp.12—13。

和帕森斯这边也是毫不留意埃利亚斯，至少在公开出版的著述中是这样。^[11]然而，纵然有种种证据显露出敌意、冷淡或无视，也不应掩盖这些论家根本上的意气相投之处。

我们为什么应当关注埃利亚斯、福柯或其他几位说的东西？他们的阐述对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行为举止或感受、思考、评判事情的方式有什么影响？相比于家庭、工作、战场等地方的共享体验，这种缓慢的、无名的处理过程，知识分子对于塑造我们的理智和想象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集体层面，知识分子的影响都面临着严格限制。职业思想者的阐述只有得到跨越时空有效传播观念的权力和能力的支撑，才会在日常生活层面产生实际影响。比如，中世纪的灵魂概念深受奥古斯丁影响的程度，可能与弗洛伊德塑造 20 世纪的身心观差不多。但不管怎么说，奥古斯丁的神学得到了中世纪教会的大力贯彻，而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受到精神治疗职业中组织有素且占据支配地位的一支的强劲倡导。举个更近的例子，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在 20 世纪 60 年代盛行于全中国，并不是因为它的思想力量和诗性表达，而是因为毛的“小红书”被一个打倒一切反对派的暴力群众运动的全体成员挥舞着。

本书的研究对象并不能也不想宣称是上述意义上的现代性塑造者。不过，对于现代性，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专家，都是极具说服力的见证者。他们的权威来自于他们成功地激起了我们的理智与想象。根本不需要认定其中有哪一位对“什么是现代性？”这个问题具有盖棺论定的“答案”。但合而观之，他们的著述和体验构成了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证据。这是因为，每位论家都可以说一直在从现代性的不同部分或侧面采集信号。这里既有地理空间的传播，也有历史时间的传承。他们来自前后两代人，四个不同的国家社会（德国、法国、波兰和美国），都深深卷入了这个世纪围绕现代性的性质与方向问题的争战。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扮演了这场斗争中的关键角色，无论政界还是思

[11] 有关埃利亚斯论帕森斯，参看 Elias, 1994a, pp.181—215; Elias, 1972。根据十分了解埃利亚斯的理查德·基尔明斯特的说法，埃利亚斯曾评论说，阿伦特这个人很好，只是研究路数纯属误入歧途（与基尔明斯特的私人谈话）。